



闽中革命纪事

李祖兴 著



鹭江出版社

闽中革命纪事

李祖兴 著

鹭江出版社

1993年·厦门

(闽)新登字08号

闽中革命纪事

李祖兴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莆田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6.125印张6插页144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33-876-0

D·85 定价：4.00元

目 录

闽中第一个中共组织的建立.....	(1)
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大革命.....	(10)
农民暴动和游击武装的发展.....	(16)
土地革命的尝试和外坑苏区的创立.....	(27)
革命在低潮中曲折前进.....	(39)
独立自主进行三年游击战争.....	(46)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红军改编.....	(68)
“七·七”事变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	(81)
沿海沦陷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92)
福建省委机关南迁闽中.....	(109)
海上游击队的战斗历程.....	(120)
发生在抗战后期的三个事件.....	(129)
“爱国游击战争”的发动与挫折.....	(139)
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恢复与高涨.....	(148)
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168)
配合南下大军解放闽中.....	(186)
后 记.....	(192)

闽中第一个中共组织的建立

1926年2月，闽中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莆田党团混合支部在莆田哲理中学的钟楼里正式宣告成立。从此，莆田乃至闽中人民革命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莆田党团混合支部成立时有6位成员，即陈国柱、陈天章、陈兆芳、吴承斌、吴梦泽和陈德来，由陈国柱任书记。支部成立后直接与党中央保持组织联系。

从这时起至年底，莆田党组织逐步发展，党员人数也随之逐步增多。

这年3月，陈国柱奉命去广州参加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他赴羊城期间，支部工作交由陈天章负责。此间，经党团支部讨论通过，支部又吸收徐贻泽、林凤池、翁祖武、王纪修、戴友梅、刘天瑞等人参加组织。陈国柱在广州的公务完成以后，由党组织安排于同年6月返回莆田。他回来后，即把2月间首批吸收的5名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将莆田党团混合支部改建为中共莆田支部，仍由陈国柱任书记、陈天章负责组织、陈德来负责宣传。支部继续与党中央保持组织联系。

7月间，分别在上海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加入中共组织的莆田籍党员林嵩龄、黄苍麟毕业返回莆田家乡，组织关系转入中共莆田支部，随后他们被增补为支部委员，参加支部的领导工作。

中共莆田支部成立后，加强了农村工作和学校工作。支部相继派党员陈天章、吴梦泽、林嵩龄、林凤池等下乡发动农民组织

农会，从中吸收骨干分子入党，并于这年秋冬先后建立了中共澳柄支部（书记陈蒲川）、中共夹漈支部（书记吴国霖）、中共山门支部（书记林凤池）、中共丰美支部（书记林清汉）和中共郊下支部（书记林文樵）。与此同时，陈国柱利用在哲理中学授课和应邀在省立四师、公学中学以及在涵江中学兼课之便，又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当时，莆田是闽中地区除泉州以外唯一设有高级中学的县份，在莆田求学的仙游籍学生邱光兆、林锦如，永春籍学生林怀才、余丽水，德化籍学生吴郅治、赖锡柱等，就是在莆田读书时被吸收入党而成为上述这些县第一批中共党员的。此外，陈国柱还派党员到咸益女中工作，于是年底建立了中共咸益女中支部（书记郭晓云）。

随着基层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党员人数的逐渐增多，中共莆田支部于1926年12月升建为中共莆田特区委。特区委的领导分工是：书记陈国柱、组织陈天章、宣传林嵩龄、农运吴梦泽、工运林清汉、兵运陈兆芳、青运陈德来、妇运郭晓云。莆田特区委成立后，经党中央决定，改归中共福州地委领导。

1927年4月上旬，莆田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右派下令通缉共产党员和左派知名人士。陈国柱因名声太大，继续在莆田工作已十分不便，于是他秘密转移到仙游开展建党工作，在莆（田）仙（游）交界的兴太上宫，陈国柱通过考察，先后介绍林锦堂、林步庭等6人入党，加上先期已在莆田哲理中学入党的邱光兆、林锦如等，便在馨山书院成立了仙游县境内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宫支部（书记林锦堂），隶属于中共莆田特区委。

至此，兴化地区所属莆田与仙游两县的革命斗争就在同一个党组织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

莆田于1926年2月成立党团组织，是大革命时期福建最早建立中共组织的三个地区之一。福州团组织建于1925年4月，党组

织建于1926年4月；厦门团组织建于1925年6月，党组织建于1926年2月。福厦两地较早成立党团组织，有它们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福州、厦门作为福建的两个主要城市，特别是福州是当时八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党较早容易理解。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县份，莆田为什么会先于本省其他各县较早成立中共组织呢？

一是由于莆田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早在1853年，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莆仙民间的“乌白旗”组织就起而响应永春人士林俊领导的“红钱会”反清起义。当林俊率部从永春开抵仙游时，仙游民众即积极配合林俊作战，于1853年9月26日攻克了仙游县城，捕杀了知县黄曾惠。接着，林俊又把斗争锋芒指向设在莆田的兴化府，莆田民众踊跃支援，曾两次配合起义军攻打兴化府，虽然两次均未能攻克，但在客观上扩大了反封建革命运动在莆田的影响。1857年至1865年，太平军曾先后4次入闽作战，不仅直接打击了福建反动统治势力，而且也给福建人民以有力的精神鼓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莆田民众于1865年底举行了“小刀会”起义，公开打出旗号与清王朝对抗，在莆仙边的莒溪坚持斗争两个多月时间。后来，清军出动大批人马从仙岭、何岭、御史岭三个方向同时包围莒溪，起义部队虽寡不敌众，但作风顽强，不屈不挠，仍英勇地同进犯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在牺牲了200多人后，起义遂告失败。到了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新的进展。1905年8月，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翌年夏，郑祖荫等人在福州建立了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并迅速派人在莆田、泉州等地吸收会员，发展组织，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此后，莆田同盟

会会员有所增加，对进一步推动莆仙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发挥了作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开始后，福建省会福州于同年11月9日得以光复。在辛亥革命和福州光复的积极影响下，莆田民众踊跃支援驻兴化新军，加速了光复兴化的进程，11月12日，兴化宣告光复。在此前后，由黄濂领导的抗官事件在莆田也持续了三四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王朝在莆田的统治力量。在这以后，莆田又相继发生了1915年沿海民众发起的结社斗争，1918年东藩农盐民砸毁盐厘总局的武力斗争，等等。所有这些，都生动地表现了莆田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战斗勇气和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这是莆田人民极可宝贵的光荣传统和精神财富。中共莆田组织的建立，正是这种光荣传统在新形势下合乎历史逻辑的延续，也是莆田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二是由于“五·四”爱国运动对莆田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莆田人民的觉醒。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消息传来时，莆田学生率先奋起响应。5月29日，莆田各中小学学生联合举行罢课，于下午1时齐集在射圃里召开声援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省立十中、四师、哲理、砺青、城东、彝峰、育英、培元、道学等16所学校的学生1000多人。会后，学生们冲破北洋军阀政府莆田当局派去的大批军警的重重阻拦，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恢复国权”、“严惩卖国贼”等口号，散发传单，群情激昂，围观群众深受感动。6月3日，北京学生又遭反动政府逮捕的消息在各地传开后，莆田学生更加愤慨。6月7日，莆田女学生300余人在城东女校召开莆田女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表示愿与男学生互勉互励，并肩战斗到底。6月11日、12日，省立十中、

四师，哲理三校学生再次罢课。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触怒了莆田反动当局，他们指责学生们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治安，于是决定提前进行期末考试，企图转移学生们的注意力，使学生们埋头于功课之中。莆田当局的阴谋遭到了学生们的坚决反对。于是当局又变换花样，匆匆宣布提前于6月13日放暑假，将期末考试推迟到秋季开学时再进行，妄想以此分散学生们的斗争力量。但学生们懂得团结战斗的可贵，没有各自离校回家。放假后的第二天（6月14日），省立十中、四师、哲理、道学等4所学校的学生邀请留省回莆学生参加，成立了莆田学生联合会，并推选了调查、执行、交际、演讲、贩卖、文牒、会计、庶务等学联会内部各方面的负责人。6月21日，在莆田学联会的组织领导下，莆田学生再次举行了爱国示威大游行，参加的除城区各中等学校的学生外，还有公立第二国民学校、私立第五国民学校、黄石善育学校的学生和留省的学生代表等，声势比以前更为浩大。次日，城区各校学生顶着烈日奔波了六七十里路，分别深入到黄石、笏石等集镇、农村进行宣传。学生们每到一处，都高呼口号、唱歌、演讲，虽大汗淋漓，但都毫无倦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自愿烧水泡茶递毛巾，有的甚至还燃放鞭炮，欢迎学生们远道而来。

在响应“五·四”运动的斗争中，学生们还大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5月29日大游行以后，省立十中学生率先组织起来抵制日货，他们分别印制了国货调查表和日货调查表，由学生分送给各商家，要求登记造册。学生们还利用课余时间3人或5人组成一支小宣传队，前往各商铺劝止老板不要销售日货；在路上看见手中持有日货的人，便多方开导，婉言相劝，请持货者到商铺更换国货。莆田女学生联合会还把从咸宜苏广店、宝顺书坊等商铺检查出来的许多日货利用起来，举办了禁用日货陈列会，使参观

的人从中受到教育。6月12日，学生们从东关外货船内查到一批日货。随后，他们即把这些货物运到仓后程夫子祠大埕焚烧，围观者热烈拍手叫好。莆田学联会刚成立时，就派学生代表10多人往涵江商会劝告商家勿售日货。16日那天，大雨滂沱，各位学生代表冒雨走东家奔西家，耐心劝导，使商人们大为感动，表示支持学生的倡议，今后不再出售日货。与此同时，莆田学联会还组织了学生演讲团和学生稽查团，专门负责向群众宣传和检查督促禁用日货提倡国货工作。演讲团自成立起，每天都在墟集或剧场演讲。6月下旬，演讲团在县城附近的东关外、城隍庙、梅花亭、南关外的五帝庙、北关外的头亭和北门兜等处演讲，听众极多，演讲每到生动处，时常被听众的掌声所打断。

学生稽查团成立后，每天均派人到东、南、北三关外码头及货栈检查日货。6月下旬，学生们在这些地方稽查到日产肥皂、玩具、白糖、火柴、摺扇、卫生衣等物品，将其没收，并于7月1日集中在东关外焚毁，吸引了很多过路的群众。莆田城区、涵江等地许多商民受到学生爱国行动的感染，自愿致函莆田商会，表示不售日货。莆田商会随即开会作出决定，支持这些商民的义举，并通知所有商家，要求一律遵守。各地商民对此作出积极反应，遂自愿将自己店内货物加盖号印作为凭据，以表示今后不再贩卖日货的决心。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感染了驻莆田反动军队中的一些基层士兵，这些有一定觉悟的士兵到商铺购物，一般都要问清所要买的这些货物是不是国货，待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肯买下；若偶尔被个别商铺瞒过去，但经识货者点明后，就会自动到那个商铺要求退换。为了把提倡国货进一步落实到实处，莆田学联会于7月21日邀请莆田商会代表20余人，共同商议组织“莆阳提倡国货联合会”，得到商会代表的支持，他们当场纷纷签名。不仅如此，莆田学联会还自筹资金办国货，派人分赴省、厦、沪等地采购，运

回莆田销售。在推销国货的过程中，莆田女学生成绩尤佳，她们三五成群，深入到城乡居民家中，耐心讲解，积极倡导，销路很广，影响极好。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它极大地推动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莆田人民尤其是进步青年学生开始摒弃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并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他们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受其影响，莆田戏剧界人士改良了传统戏剧，查禁了一批诲淫诲盗、迷信鬼怪的剧目，净化了演出舞台。同时，编排并上演了一批有进步意义的剧目。为了使新思想、新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莆田学联会于“五·四”运动后的翌年7月创办了一张用白话文编排出版的《莆田新报》。该报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封建主义对人民的精神毒害等，都加以批判；对废止读经、采用白话教学、改进剧目、阅读科学著作等，都加以倡导。由于报纸政治倾向明朗，读者逐日增加，其影响也逐渐扩大到城乡各地。其他一些报纸，如《奋兴报》等也开辟有新文学园地，刊载大量包含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新诗作。

“五·四”运动对莆田的深刻影响，使莆田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莆田的传播和促进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三是由于莆田籍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莆田的革命实践和建党活动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

莆田在历史上曾被誉为“文献名邦”，这里的人文化水平高，因之思想也向来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受过进步思想熏陶的青年学生，相继考入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地的高等院校。他们在这些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城市里，一边求学，一边开始接触并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莆田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当中，陈国柱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林嵩龄、黄苍麟等人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五·四”运动期间，陈国柱就是一个学生积极分子。那时他正在莆田哲理中学读书，自觉参加了校内罢课、上街游行、下乡演讲、抵制日货等活动。正是在那段时间里，陈国柱在学校看到了数期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他的头脑里留下了印象。1921年3月，他考上了厦门大学，此后数年间，他在同校同学、中共党员施乃铸的引导下，阅读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中国工人》、《中国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并参加了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讨论和研究，思想认识逐步升华。1923年暑假，他将施乃铸赠送的30多本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带回莆田，在同乡和母校进步学生中传阅，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莆田的最早传播，使进步青年学生进一步开阔了眼界。1924年4月，他因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迫害，于是便同一批进步学生转到上海大夏大学继续学习，在该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寒假，他受全国学生总会指派，从上海带回许多革命宣传品，在莆田城乡散发，传播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25年，陈国柱被选为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成员，参与组织学生和沪西工人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同年秋，陈国柱由施乃铸、黄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继续在上海高校中从事学生运动，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年底，陈国柱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返莆后被聘在母校哲理中学教授高中国文与社会学课程。他利用教学之便，在学生中相继主持成立了“读书会”、“学术研究会”等组织，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在上海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莆田籍学生林嵩龄和黄苍麟，也分别于1925年在他们各自的学校加入了中共组织。他们在上海就读时曾多次利用假期带回多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在莆田进步学生和其他阶层知识分子中传阅。马克思主义在莆田广泛传播，为中共莆田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四是由于党中央对莆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迎接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为了加强领导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着重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取得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现阶段，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领导地位，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职责。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抓紧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于同年底毕业的陈国柱在离开大夏大学返回莆田前，党中央即派袁孟冰找他谈话，要他回莆田进行建立地下党的工作，直接和党中央发生组织联系。陈国柱奉中央之命，在回莆田后的1926年2月就建立了中共莆田组织。

中共莆田组织的建立，在莆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莆田乃至闽中地区人民长期以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大革命

自从莆田有了中共组织以后，莆田第一次国共合作也随之开始了。1926年3月初，中共莆田组织的创始人陈国柱即着手筹建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但当时并未公开，他在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只称之为“民校”。随后不久，陈国柱赴广州工作。同年6月，他刚返回莆田，一些莆田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如从大夏大学回莆田的曾天毅、陈震等人，就来找他，要求共同成立国民党县党部。陈国柱同意与这些左派人士合作。于是，在这年的夏天，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便联合成立了国民党莆田筹委会，但仍未公开挂牌活动。筹委会工作由中共莆田支部书记陈国柱主持。为了加强中共在筹委会中的力量并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共莆田支部所属党员及共青团莆田组织的全体团员都加入了筹委会，而成为这个国共合作组织的骨干。随后，陈国柱又布置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抓紧发展组织，帮助建立国民党区分部，以合法手段扩大中共组织的领导范围。

1926年11月下旬，北伐军攻抵莆田，北洋军阀政府在莆田的统治遂告结束。为了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孤立少数国民党右派，陈国柱主动与国民党左派人士曾天毅、郑炳炎、陈震等商量，正式将“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挂出去，公开进行活动。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农民运动和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的影响，陈国柱写信向广东海陆丰农民协会要来了农协章程和图章

模样，准备建立全县性的农协组织。

陈国柱等人的举动，触怒了何显祖等几个国民党右派分子。这些人对陈国柱等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先是派清末秀才叶宣阶出面拉拢陈国柱，说只要陈国柱愿意与他们合作，可以设法举荐陈担任莆田县县长，但这一诱惑遭到了陈国柱的严词拒绝；一招不成便又来一招，接着这些人便指使右派分子陈邵、陈维俊、郑宗龙、马秉衡公开出面闹分裂，挂出“国民党莆田县党务整理处”的牌子，与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分庭抗礼，各区以何显祖控制的“民团”分子为骨干出面闹分裂，并破坏农民运动。于是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从此开始逐渐激烈起来。但这时莆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力量仍占优势，右派分子无可奈何。

北伐军攻克福州后，即于同年12月在榕举办了第一期党政干部训练班，由中共党员马式材、国民党左派人士李培桐等主持。陈国柱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培养干部，作长远打算，便派陈天章、陈兆芳、王纪修、陈磊、李培兰、林景亮、陈德来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骨干前往学习。

12月27日，陈国柱被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为农运特派员。随之，陈国柱便以这个合法身份在莆田城内鼓楼顶设立了“农运特派员办事处”，公开进行全县性农协组织的筹建工作。翌年1月，莆田县农民代表大会在鼓楼顶召开，各地100多位农民代表参加了会议。国民党右派分子闻讯，事先从华亭雇来30多个打手，趁会议召开之时冲进会场起哄并出手打人，有些代表为了避免挨打，从鼓楼上跳下离去。这就是莆田有名的“跳鼓楼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表明莆田左派与右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莆田县农民协会因右派捣乱虽然未能如期成立，但全县农民运动依然蓬勃发展。

“跳鼓楼事件”传开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遂派卢振柳到莆

田任国民党县党部筹备主任，此后，原党部筹备处和党务整理处均无形中消失。尽管如此，陈国柱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仍继续致力于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1927年4月8日，莆田国民党右派步福州国民党右派的后尘，发动事变（史称“四·八”事变）。这时陈国柱等人恰好在农村，幸免于难。此后，原党部筹备处其他成员也陆续转移到农村开展活动。所以，从1927年1月至5月这段时间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没有掌握到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的领导权。

莆田第一次国共合作，却例外地从1927年夏天起至1928年冬天止，出现了一个与全国其他地方大不相同的奇特现象。全国其他地方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到1927年“四·一二”上海政变和“七·一五”武汉政变以后，就已彻底破裂，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而莆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7年6月以后反而有了新的起色。这个月，由陈国柱派去省党政干部训练班学习的莆田中共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在学习结束后被国民党省党部派回原籍莆田继续进行县党部的筹建工作。接着，国民党莆田县党部在省党部代表的监督下正式成立，投票选举结果，右派大败，左派获胜，县党部中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为此，中共莆田特区委在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中秘密设立了中共特别支部。所以，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共莆田特区委书记宋耀华主持。从这时起直至1928年11月，中共莆田组织在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推动了莆田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1928年11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解散了国民党莆田县党部，另外成立了国民党莆田县指导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员重新进行登记。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莆田县委（1927年12月，中共莆田特区委升建为中共莆田县委）决定所有共产党员于同年12月退出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莆田县党部后，虽经国民党

莆田县指导委员会多次催促登记，参加登记的国民党员人数总共才11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党员在国民党莆田县机关中所占的份量。这次莆田“清党”与中共党员全体退出国民党，表明比全国其他地方延伸了一年多的莆田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也已结束。

莆田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是在曲折中进行的，但国共两党在合作期间仍有力地推动了莆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掀起了大革命的热潮。

在国共合作伊始的1926年3月，教会为纪念“复活节”，在美会教堂布置会场准备开会。这时，莆田哲理中学美籍校长章文新正把一面五色旗^①倒置，用来包裹装饰欲摆在台上的花盆、花瓶，正好被陈天章发觉。于是陈天章即召集党团混合支部成员开会，接着又发动哲理中学学生开会，揭露章文新有意蔑视中国的行为。随后陈天章带领学生与章文新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终迫使章文新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向中国国旗行三鞠躬礼。通过这次斗争，激发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同年5月30日，是学生、工人要求收回租界而被帝国主义巡捕镇压的“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莆田各校2000多名学生，冲破驻莆田北洋军阀当局董胜标颁布的种种禁令，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曾一度冲过“警戒线”，在董胜标旅部门口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苛捐杂税”、“抵制英日货”等口号，反帝气氛浓重热烈。

在北伐军攻抵莆田后，中共莆田组织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开展了“非基”活动^②，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宗教渗

①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国旗。

②即反对基督教和教会的斗争。